

初唐四杰诗选

任国绪 选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初唐四杰诗选

任国绪 选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插页 183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0374-3/I·96

定 价：4.50元

责任校对：李文学 宋树帜

前 言

公元7世纪后期，在我国诗坛上兴起四颗光辉灿烂的新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相似的人生遭遇，同样杰出的才华，工力悉敌的诗文创作，使他们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被时人称为“四杰”或“四才子”，文学史上则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有关“四杰”的研究不断深入，半个世纪前，闻一多先生撰写了《宫体诗的自赎》、《四杰》等论文（编入《唐诗杂论》），对“四杰”的为人及其诗歌在思想题材方面的开拓，提出了很好的见解，认为他们是在唐诗的开创时期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50年代，刘开扬先生撰写了《论初唐四杰及其诗》（编入《唐诗论文集》），对其生卒年进行了大致的考证，对其诗歌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60年代，马茂元先生撰写了《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骆临海集笺注·附录》），着重探讨了“四杰”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及骆宾王诗歌的成就。进入80年代，“四杰”的研究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傅璇琮先生在其所著《唐代诗人丛考·杨炯考》中对旧史有关“四杰”为人“浮躁浅露”的记载提出质疑，从而否定了“四杰”的这一传统偏见；既而又编撰了《卢照邻杨炯简谱》（中华书局铅印校点本《杨炯集·卢照邻集·附录》），排比考定“四杰”的生平行迹，为研究“四杰”提

供了许多一手资料。此后，有关“四杰”生平、作品考定及其评论的文章不断涌现，许多文章都不乏新见，一些考证结论都建立在翔实可靠的材料基础上，较为可信。应当说，有关“四杰”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很好的势头，相信这股势头还将持续深入地向前发展。

为适应广大读者、研究者阅读及研究的需要，笔者编选了这本小书，尽可能选择“四杰”有代表性的诗篇——兼顾思想、题材、体裁、文学价值及资料价值等各个方面，用较为通俗的语言予以注解、简评，注意吸收前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力求反映出当今对“四杰”研究的新水平。

为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本书，这里拟将有关“四杰”及其诗歌创作情况予以简略的介绍。

一、关于“四杰”的称号

“四杰”的称号，当在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有生之年就已产生。据骆宾王死后不久奉命搜集骆宾王诗文的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说：“骆宾王……高宗朝，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此外，稍后于“四杰”的张鷟，在其所著《朝野僉载》卷六中也说：“卢照邻……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这里说卢照邻在蜀中时就已听到“四杰”的称号，则其时间当在咸亨前期（670—671）。其时王勃也在蜀中。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说他游蜀时“考文章之迹，征造化之程，

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词，每有一文，海内惊瞻。”从这段话看，“四杰”的称号产生在王、卢居蜀时，应当是可信的。问题是，按张鷟的记载，“王、杨、卢骆”的排列顺序似乎带有品鉴其文才高下的意义；可是按郗云卿的说法，“四杰”的排列顺序却是“卢、骆、杨、王”。这说明，当时虽有“四杰”的称号，但四人的排列顺序却没有固定。与杨炯同时的张说在他所撰《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中，记载裴行俭在选曹见四子说：“……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其排列顺序与郗、张的记载又自不同。

到了五代刘昫所撰《旧唐书》杨炯本传中，又进而发挥了张鷟的说法，其文曰：“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由于《旧唐书》为正史，在旧时代具有权威性，所以“王、杨、卢、骆”的顺序便沿袭下来。闻一多先生在《四杰》文中说：“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又说：“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这样对传统说法做出新的解释，恐怕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伟大诗人杜甫，对“四杰”予以高度评价，他的《戏为六绝句》就有两首是评“四杰”的。第一首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第三首则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可见，到了杜甫时代，四人的顺序仍并不固定。

在今天看来，“四杰”才华相匹，其诗文创作各有所

长，工力悉敌。我们现在称“王、杨、卢、骆”，只是沿用传统的多数说法而已，就不应再认为寓有品鉴的意义。

二、关于“四杰”的家世及思想

有关“四杰”的家世，两《唐书》本传或付之阙如，或语焉不详；其他载籍，也“不少概见”（胡震亨《唐音癸签》）。王勃的家世，目前尚可据《文中子世家》查索；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家世就难以详考。大抵四人都出身于有较高文化层次、以儒学传家的封建官吏家庭。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王氏家族是大姓望族。这个家族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以学问节操著称于世的人。王勃在《送劼（王勃弟）赴太学序》中说：“且吾家以儒辅仁，述作者八代矣，未有不久于其道而求苟出者也。故能立经陈训，删书定礼，扬魁梧之风，树清白之业，使吾徒子孙有所取也。”据《文中子世家》，王勃的八世祖王玄则，七世祖王涣，六世祖王虬，五世祖王彦，四世祖王一，并有著述。六世祖王虬事北魏为并州刺史，家河汾，号晋阳穆公。王氏定居绛州龙门，即自王虬始。王勃的祖父王通，隋末隐居龙门，以讲学著述为业。杨炯《王子安集序》说他“循叹凤之远图（指隐居），宗获麟之遗制（指孔子所修《春秋》），裁成大典，以赞孔门，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续《诗》。又自晋太熙元年（290），至隋开皇九年（589）平陈之岁，褒贬行事，述《元经》以法《春秋》。”王通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之例，

为主客对答之说，号《中说》。杨炯说他曾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而后弃官隐居。《文中子世家》则未载其为官。王勃的父亲王福畴是王通次子，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参军、六合交阯二县令、齐州长史等职。撰《王氏家书杂录》。杨炯说他“抑惟邦彦，是曰人宗，绝六艺以成能，兼百行而为德”，可见其博学多识及声望。王勃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祖父王通的人品、治学精神及学术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王勃好学崇儒，即来自乃祖遗风。王勃的父亲对子女教育很严格，他把继承家学渊源的希望主要寄托在王勃身上。杨炯说他“司马谈之晚岁，思宏授史之功”，即为明证。他教育子女以循循善诱的鼓励方法为主，其友人韩思彦曾说他有“誉儿癖”。王勃兄弟皆博学多才，这和他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及其附近）人。范阳卢氏是山东士族集团的大姓望族之一。卢照邻在其《释疾文·粤若》中称卢氏的先人出自春秋齐国太公望之后，又提到秦代的卢敖、东汉的卢植、晋代的卢谌。他赞扬自己的家族说：“彼圣贤之相续，信古往而今来。人何代而不贵，代何人而不才？”他还在《对蜀父老问》中借蜀父老之口说：“子非衣冕之族欤？”在《五悲·悲穷通》中他也借他人之口说：“子非有唐之文士欤？燕地之高门欤？”但是，有关自己祖父、父亲的名字及仕履，他却从未提及，其他史籍也不见记载。显见其仕宦未尝荣显。卢照邻在上举《释疾文》中还说：“弥九叶而逮余兮，代增丽以光熙。清风振乎终古，妙誉薰乎当时。皇考庆余以弄璋兮，肇锡余以嘉词，名余以照邻，字余以升之。余幼服此殊惠兮，遂阅礼

而闻诗。”可见其父祖虽仕宦不遇，但卢氏以诗礼传家的家风仍著称于当时。卢照邻幼年得到家教，十三岁又南下游学，从著名的文字学家曹宪学《苍》、《雅》；嗣后又从王义方学经史。学成之后，“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惊。通李膺而窃价，造张华而假成。郭林宗闻而心服，王夷甫见而神倾。”可见其才名早著。

杨炯，字不详，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他的家族本弘农杨氏，是关中大姓望族。他在《群官寻杨隐居诗序》中说：“西汉十伦，东京四代，则吾宗之人物，盛于天下。”在《常州刺史伯父东平杨公墓志铭》中说：“杨氏之先，其来尚矣……西京为丞相，东汉为司徒，魏室为九卿，晋朝为八座，此之谓代祿。”提到杨敞、杨震、杨彪、杨骏等。杨炯的这位伯父杨德裔，曾官御史中丞，历任棣、曹、桓、章四州刺史。他的另一位伯父杨德干，也历任泽、齐、汴、相四州刺史等职。不过，有关杨炯的祖父、父亲的名字及仕履，杨炯也未尝提及，只在《梓州官僚赞·司法司军杨炯自赞》中称“吾少也贱”。看来他的父祖仕宦都未尝荣显。杨炯幼年的情况，不得而知，从他十岁应神童举即待制弘文馆来看，他早期也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骆宾王，字不详，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骆宾王的先祖是否有过高官显爵，已不可考。我们只是从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中得知其父作过一任博昌县令，早卒于任所。其书曰：“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虽远，遗爱犹存。”据陈熙晋考证，其父卒后即葬于博昌，直到骆宾王赴临海丞任时始扶柩南归，将其父母尸骨合葬于义乌老家。在“四杰”之中，恐怕是骆宾王的出身最为寒微。骆宾王幼年随父居于博

昌任所，受到他父亲的严格教育。他把齐鲁之地看做第二故乡；“托根邹邑，时闻阙里之音；接闭天津，屡听杏坛之说。”（《上兖州张司马启》）陈熙晋说他“趋庭奉训，负笈从师，学问得于齐、鲁者为多。”

“四杰”号多出于大姓望族，但到了他们父祖这一辈，家道已经衰落。王勃的哥哥为勃所作《倬彼我系》诗序中说：“《倬彼我系》，舍弟虢州参军勃所作也。伤迫乎家贫，道未成而受禄……。”王勃也在《送劼赴太学序》中说：“而房旅多孤，仔粥不继，逼父兄之命，睨饥寒之切，解巾捧檄，扶老携幼，今既至于斯矣。”卢照邻在《寄裴舍人诸公遗药直书》中说：“余家咸亨中良贱百口，自丁家难，私门弟妹凋丧，七八年间货用都尽。”骆宾王于父亲去世后奉母居于兖州瑕丘县，生活清贫，“藜藿乏甘旨之养，松楸缺欠厝之资”。（《上吏部裴侍郎启》）。读书之余，他还参加一些农事劳动“力农贱事，未免东皋之劳”（《上廉察使启》），“预迹耦耕，欣日出而知作”（《上郭赞府启》）。总之，就他们的实际经济地位看，他们应属于庶族知识分子。

“四杰”的家庭出身及影响，使他们的思想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

首先，他们都具有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王勃在十五岁就上书右相刘祥道，要求起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天下遗俊”：“伏愿群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磨钝的铉，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博风，舍蓑衣而见绛阙。”书中还条陈军国大事，提出改革时弊的主张，表现

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卢照邻在《五悲·悲穷通》中追述其早年的进仕之志说：“常谓五府交辟，三台共推，朝纒会稽之绶，夕献长杨之词。”骆宾王早年经历“贞观之治”，他在《上司列太常伯启》中说：“幸属乾坤贞观，乌兔光华……虽无为光宅，欣预比屋之封；而有道贱贫，耻作归田之赋。”杨炯十岁就应神童举，待诏弘文馆。都说明他们锐意进仕的情况。王勃上书反对唐朝侵略高丽的不义战争，反对各级官吏徇私枉法，提出重耕织之务、擢拔人才等主张，都与儒家的政治主张相合。卢照邻在诗中赞扬九陇县令柳太易“弦歌而治”的政绩，向往后汉中牟县令鲁恭的德政及莱芜长范云的清操（卢集卷二载《失群雁》有云：“金龟全写中牟印，玉鹄当变莱芜釜。”）也表现了儒家以德化民的思想。“四杰”都具有耿介的性格，看不惯当时官场的庸俗作风，不肯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这也和他们父辈的影响有关。

其次，当“四杰”仕宦不遇，连遭挫折之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又在他们思想中占了上风。王勃在入蜀后即“雅厌城阙”，在经历曹达案件打击之后，朝廷曾再度起用他，但遭到他的拒绝，从此再未入仕。卢照邻在新都尉秩满之后，也再未入仕，尽管这和他染风疾有关，但他在思想上也确是厌倦仕途了。他在《过东山谷口》诗中说：“不知名利险，辛苦滞皇州。始觉飞尘倦，归来事绿畴。”这和陶渊明《归去来辞》所说“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如出一辙。骆宾王晚年经常陷入仕与隐的矛盾之中，最后终于辞去临海丞。只有杨炯终于盈川令。

“四杰”之中，卢、骆的情况有其特殊之处。卢照邻在《释疾文·粤若》中说：“先朝好吏，予方学于孔、墨；今

上好法，予晚受乎老、庄。”这和他晚年身患不治之症（风疾）有关。他为治病，先后在太白山、东龙门山、具茨山服饵学道，成为虔诚的信徒。另外，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也和他看破仕途，不甘再受其束缚的思想合拍。

骆宾王由于出身寒微，他思想中的布衣感很强，他每以“布衣之士”自称。他读书范围很广，“至于九流百氏，颇总缉其异端”（《上瑕丘韦明府启》）。这使他的思想受到诸子百家多方面的影响。他在《畴昔篇》中说：“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他仰慕古代布衣英雄的遗风，他所追怀的英雄人物就有鲁仲连、荆轲。他在落魄的岁月里常叹息“游无毛薛之交”，幻想结交战国时与信陵君相交的博徒卖浆者毛公、薛公一流人物。《旧唐书》本传也记载他“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看来，在他思想中有不少纵横任侠的成分。闻一多先生早就看出他“天生一副侠骨”，并说：“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都是他干的。”（《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这里，除“杀人报仇”我们找不到证据外，其他都是事实。在“四杰”中，骆宾王是行为最为狂放不羁，富有浪漫色彩的。“四杰”虽都追求边塞军功，但只有他身体力行，三次从军。最后，他怀着“宝剑思存楚，金锥许报韩”（《咏怀》）的雄心，参加许敬业幕府随其起兵讨武则天，演出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威武悲壮的活剧。他这方面的思想性格，酷似后来的大诗人李白。

三、“四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闻一多先生指出，“四杰”是在唐诗的开创时期负起

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完成了开创唐诗的时代使命呢？这里拟谈三个问题。

第一，“四杰”在理论上拨正了唐诗沿着《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健康发展的方向。“四杰”步入诗坛时，占据诗坛统治地位的是上官体诗。这种诗，内容上描写御苑风光，点缀花草，严重脱离社会人生；形式上一味追求“绮错婉媚”，雕刻藻饰，讲究琐细的对仗，诗风浮艳。如果唐诗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必然走进形式主义的死胡同。王勃自觉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上官体的弊病，与之进行坚决斗争。据杨炯《王子安集序》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王勃批评上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实际就是提出恢复汉魏风骨，创造清新刚健的新诗的理论主张。据杨炯序说，这一理论主张在当时立即引起反响：“薛令公（元超）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形成了一派革新势力。斗争的结果是：“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

在这场斗争中，王勃的贡献最大。他深知，要打倒上官体，就必须彻底清算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以勇敢积极的姿态上书吏部侍郎裴行俭，指出：“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天下之文，靡不坏矣。”

竟然说，自屈原始，文风就有问题，把汉赋、魏晋诗也都连带进去。这真是一种最激进的复古主张。其实王勃的目的在于以“矫枉过正”的言词引起人们对继承《诗经》传统的高度重视，并非要把《诗经》以后的文学一概否定掉。当时在“积年绮碎”的“香风迷雾”笼罩之下，在人们久已麻痹的心灵中，不这样“危言耸听”地大声疾呼，是不足以发聩震聋的。此外，还应看到，王勃指出形式主义的文风导致“齐梁之危”、“周陈之祸”，是把文风的好坏提到关乎国家兴衰治乱的高度来看问题。在同文中他还说：“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苟非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又在《平台秘略论·艺文》中说：“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都强调文学经时济世、移风易俗的社会政教作用。他通过裴行俭建议朝廷“默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从而“崇大厦”、“匡弊俗”。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他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就更有力量。

杨炯序中没有提到骆宾王的名字，但从骆在《和道士闺情诗启》中对齐梁诗的批判和对某道士诗的赞扬上，可以看到他与王勃的一致观点，他说：“爰逮江左，讴谣不辍。非有神骨仙才，专事玄风道意；颜谢特挺，戕伐典丽。自兹以降，声律稍精。其间沿改，莫能正本。”又说：“弘兹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际之源，救四始之弊，固可以用之邦国，厚此人伦。”这也完全符合《诗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传统诗教。他还在《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中说：“徒以易象六爻，幽赞通乎政本；诗人五际，比兴存乎国风。故体物成章，必寓情于小雅；登

高能赋，岂图荣于大夫！”主张为诗当继承《诗经》的兴寄美刺精神。这正与上官体背道而驰。

卢照邻在《乐府杂诗序》中对六朝的乐府诗作了批评，指出：“议今文者或以东朝为美，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潘陆颜谢，蹈迷津而不归；任沈江刘，来乱辙而弥远。”他认为诗歌正确的发展方向必须归于孔子所主张的礼乐之道。他在《南阳公集序》中说：“昔者龙腾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灭诗书而愚黔首。”他也苛刻地指出：“屈平、宋玉，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激进的态度与王勃一样。但卢照邻并非主张把诗歌简单地拉回到《诗经》的时代，他不过是把复古作为一种变通的手段，对诗歌创作，他是主张创新的。他在《乐府杂诗序》中说：“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兹乎！”所谓“发挥新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开拓新题材，表现新时代新生活；“开凿古人”，就是既要继承传统又要超出传统；“自我作古”，就是强调亲身实践，为后人树立典范。至于具体评论汉魏六朝以来的诗歌创作，他还是正确肯定了其艺术成就的。他在《南阳公集序》中说：“两班叙事，得丘明之风骨；二陆裁诗，含公干之奇伟。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江左诸人，咸好瓌姿艳发。……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对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说，也持有公允的态度：“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四声未分，梁武帝长为聋俗。”骆宾王也在《和道士闺情诗启》中说：“河朔辞人，王刘为称首；洛阳才子，潘左为先觉。若乃子建之牢笼群彦，士衡之

簪甚当时，并文苑之羽仪，诗人之龟镜。”对齐梁诗，在批评“其间沿改，莫能正本”的同时，也肯定其“声律稍精”。所以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能够吸收借鉴六朝诗的技巧，并予以提高发展。

针对上官体内容空洞，感情虚伪的弊病，卢照邻提出“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爱清灵，不以繁词为贵”的创作原则，即主张抒写真情，反对绮碎雕刻，提倡清新活泼的诗风。骆宾王也提出“盖欲乐道遗荣，从心所好，非敢希声刻鹄，窃誉雕虫”（《帝京篇启》）这样相同的原则。他们都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真实感情，这正是诗歌的生命力之所在。

第二，“四杰”在诗歌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们的诗跳出了宫廷狭窄的圈子，面对较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人生，思想严肃，主题深刻，题材多样，感情真实丰富，有风有骨，刚健清新，为唐诗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他们的诗歌注重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讽刺暴露了上层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对他们的权势荣华予以大胆的否定。在王勃的《临高台》，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等诗中，借助于七言歌行这种新的体裁样式，用铺张扬厉的手法，生动鲜明地勾勒出长安社会的生活风貌和都市的繁华。透过这种表面的繁华，我们看到的是王侯贵戚、禁卫军官等上层人物生活上的奢侈腐败，政治上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对此，诗人们予以迎头棒喝：“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长安古

意》)“莫矜一旦擅繁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帝京篇》)“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临高台》)这种对旧秩序的批判，表现了“四杰”作为时代、阶级新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四杰”的诗歌还特别表现了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妇女的生活命运的关注，以及对她们种种不幸遭遇的同情。高宗前期，战争频仍，士卒的远征和经年不归，造成许多家庭的痛苦。这在王勃的《采莲曲》中得到突出的反映。这首诗采用乐府旧题，描写江南的采莲妇女对远征塞北的亲人的苦苦相思，十分动人：“相思苦，佳期不可驻；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佳人不在兹，怅望别离时。牵花怜共蒂，拆藕爱连丝。故情无处所，新物徒华滋。”最后，诗人写道：“徘徊莲浦夜相逢，吴姬越女何丰茸！共问寒江千里外，征客关山路几重？”点明战争带给劳动妇女的痛苦何止一家，扩大了题材的社会意义。王勃的《铜雀妓》还以吊古的方式表达了对沦为歌舞伎的妇女的同情。这和齐梁宫体诗作者的态度截然相反。可贵的是，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还写出受压迫被侮辱的歌儿舞女，已经不甘于供人追欢买笑的生活地位，生发出对于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的向往：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尤须特别指出的是骆宾王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和《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这两首诗，前者破格地反映了男女道士之间的爱情：“想知人意自相寻，果得深心共一心。一心一意无穷已，投漆投胶非足拟。”这种爱情以自相寻觅、心心相印为思想基础，这是多么新鲜的民主意识！后者实际是首弃妇

诗，诗中多方面地描写了郭氏被弃的痛苦，表现了诗人对郭氏的深切同情。这是两首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实属罕见。

“四杰”的诗歌以自身生活经历为题材，广泛描写人生的种种际遇，歌唱理想追求，抒发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之情，使诗歌真正成为自觉的抒情文学。他们那些大量描写奉使行役、探亲访友、赴任还乡等行旅之诗，以及送别赠答、酬唱奉和的作品，都表现了这方面的内容。

“四杰”的生活和创作集中在高宗与武氏政权交替时期，国家承“贞观之治”，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持续向前发展。这激发了“四杰”的进取热情和信心。王勃在《临高台》中高唱：“高台四望同，佳气郁葱葱。”表现了十足的时代自豪感，闻一多先生所赞扬的卢、骆歌行中表现出的“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都是诗人时代热情的反映。这样，在他们初入仕途之际，对人生都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王勃那首千古传诵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就是典型代表。

“四杰”对人生的理想，有时还表现在对边塞军功的追求向往中。从杨炯《送刘校书从军》诗中，可以看到，当时将帅出征，幕府中很需要协助参赞军机、起草军书的人才。吴之器《骆丞列传》说：“辟掌书记，时最称雄任，士人多阶以显。”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常把边塞看作自己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用武之地。杨炯《从军行》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两句名言，呼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运用乐府旧题所写的五言律诗如《刘生》、